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在肇庆举行

谭棣华

由广东省史学会和广州市地方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于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肇庆隆重举行。来自广东地区的科研、高等院校的史学工作者，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县档案馆、博物馆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继去年一月第一次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聚会，它是为了检阅一年多来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的成果，并推动这一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而召开的。广东社会经济有其独特的地方，明清以来，广东社会经济取得速迅发展。在近代，由于它濒临南海，与各国交通便捷，得近代化风气之先，由于它深远的历史渊源及其特殊地理位置，广东成为一个后来居上，经济发展迅速的典型。如果我们观察现在，放眼未来的话，不难看出广东正肩负着一个实现四化的先行者的重担。鉴古可知今，懂得了历史，才能理解现在。对广东的经济史作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今天制订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可收到古为今用之效。所以对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二十多篇。根据论文的内容，会议就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市镇贸易三个问题，以及历史学与档案学如何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问题进行讨论，会后准备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第二辑）出版，以饷读者。

关于明清广东的农业经济问题，无论是生产力的水平，还是农业结构的变迁，或是土地与人口的变动情况，均为与会的同志所注目。有的同志就明清两代人口与土地变动状况，提出专题论文，认为五百多年来，广东人口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高而渐低到登山式的特高过程，土地则经历了一个由低而渐高的过程。广东到清代已存在着人口过剩的问题，实质上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关于农业经济问题，会上有人就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了个案的分析。认为愈来愈重的人口压力是农业商业化的催化剂。由于人口的压力，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以水稻为主的比较单一的作物，逐渐改为种植品种繁多的商品性农作物，形成多种农业作物组合型结构的农业，出现了专业性商业化农业区域和商品性农作物的中心产地。商品农作物产品加工业也随之而兴起，小生产者家庭对市场的依赖日益加强。这部分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已经不是明代以前的偶发性，稀少的关系，而是经常性的普遍关系。他们的利益与市场经济脉膊一起跳动，两者几乎融为一体。

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农田水利的建设，有的同志就此作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广东不但珠江干支流沿岸修建了许多堤围，而且连出海口附近的海滩也筑围了。在粤北山区和高雷高亢地带，陂塘相当普遍。同时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维修制度，用水管理制度也日臻完善。农田水利的发展，促进了桑基鱼塘的发展，改变了农民单一经营水稻的经济结构，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有的同志在分析广东农业经济在人口增加、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改进、水利兴修、耕地面积扩大之后，认为租佃关系的变化和地租形态的演进，加剧了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封建经

济的趋向解体，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总之，与会同志认为，明清广东农业经济在全国来说，变动是巨大的，并且显露出独特的地方色彩。

至于说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问题，与会者在粤海关制度，高利贷资本，以及一条鞭法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探讨，特别粤海关的某些措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有的同志认为粤海关自乾隆二十年起，广州成为对外贸易唯一港口以后，为了保证征收关税的便利，粤海关建立了若干有别于其它海关的特殊制度，如以行商制度来管理对外贸易，在关税征收上，实行减税通商制度，为外商来广州贸易大大提供了方便，从而使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趋向繁荣，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粤海关实行的减税通商，虽然有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但不断的递减关税，又使得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将工业产品大量输入广州，从而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

针对粤海关减税通商问题，有的同志却认为，粤海关是一块肥肉，上至天子，下至家丁及书吏巡役，无不借权勒索，上下其手，因此粤海关税的收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分赃制，尽管其法定税率很轻，可是由于粤海关的腐败，又使得关税的实际征收率比税则规定的要高得多。它的腐败，必然阻滞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会议还就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发展，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功能、作用等展开热烈的争论。讨论中，有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作全面论述的，有把佛山商业繁荣作个案研究的，有尝试以佛山和景德镇作城市经济比较研究的。在对比佛山与景德镇这两个同属于手工业城镇类型时，有的同志认为它们都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郡县城市”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因素在两者形成过程中，都起了决定的作用，民营手工业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封建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显示了中国封建城市经济结构出现了某些值得重视的新因素。

同时，大家还觉得，对墟市的研究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面上，必须从农业经济结构变迁角度来考察广东墟市的发展与变化。墟市的发展水平受制约于商品化程度，交通条件与人口密度等因素。为此，有的同志以明中叶以来珠江三角洲农村墟市发展为例，说明广东墟市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迅速增加，规模的扩大，而且在功能上也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连。而清代大量专业墟市的出现，却是专业化农业区域出现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墟市的分布是基于每单位面积的购买力，也取决于人口密度与家庭依赖市场的程度，它的定点则是根据供求状况，交通条件确定的。但墟市的布局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口密度、商品化水平、交通发达程度等条件的变化而经历着一个兴废无常的不断调整的过程。

墟市的发展经历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其内部设置也由简而趋繁，从粗陋到不断完善。就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言，按其功能，大概可分为原始墟市、基本墟市、专业墟市、市镇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的墟市构成了珠江角洲地区商品流通的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明中叶以后，广东墟市的发展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墟市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逃脱以宗族势力形式出现的封建势力的魔掌，它对墟市的控制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会议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但与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明清史的研究，尤其是地方史的研究，如果不利用明清档案，是很难作出突破性的研究的：可喜的是，这次讨论会有部分档案馆的同志参加，史学工作者与档案工作者的携手合作，对今后地方史的研究一

定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历史学与档案学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风气，应该充分发扬，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的研究，只有在档案工作者有力配合支持下，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袁崇焕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召开

阎崇年

1984年6月21日至26日，纪念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御后金的著名将领袁崇焕诞生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西藤县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广西历史学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藤县人大常委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自黑龙江畔至珠江之滨的全国一百二十余名明清史的专家、教授、学者等，向大会提交论文五十篇。这次学术讨论会，以研究袁崇焕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就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明末党争、明清（后金）关系、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特别就袁崇焕的历史地位与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学术交流。

第一，袁崇焕与明末党争。明朝自万历以来分成的浙、楚、齐、宣、昆各党，天启时合而为阉党，与之对立的是东林党。辽事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一个重要题目。袁崇焕虽然不是东林党，但他倾向于东林。袁的奥援师长大学士韩炉、孙承宗、钱龙锡都是东林党人。阉党与东林党之争直接关系到辽东经抚的任免与辽军战守的胜败。崇祯初阉党虽受到沉重打击，但其余焰未熄。许多人认为阉孽与东林党之争，是酿成袁崇焕悲剧的重要原因；而明末党争对袁崇焕军事成败与含冤磔死，其影响之程度，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第二，袁崇焕在抗清（后金）中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洲兴起，是对明朝封建统治者反动民族压迫与民族分裂政策的反抗，后来清人关统一了中国。以皇帝、宗室、宦官、戚畹、权臣和缙绅为代表的明末大地主集团，是当时社会上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袁崇焕的行动实际上代表了后者的势力。另一种意见认为，在袁崇焕任辽职的天启二年至崇祯二年间，满洲军事贵族屡次南犯掠夺的战争是不义之争。袁崇焕抵御后金的斗争，反映了中原和辽东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因此，他是一位民族英雄。

第三，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功过是非。一说毛文龙抗敌有功，袁崇焕误中皇太极间计诛之，为后金翦其所忌，自伤股肱，是袁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另说据《满文老档》和《李朝实录》等资料，认为毛文龙与后金秘密通款，袁崇焕设计斩之，是其一大功绩。还有一说，毛文龙有功有过；袁崇焕擅诛大将有不当之处，可谓其有功亦有错。

第四，袁崇焕"谋款"评价。袁崇焕同皇太极"谋款"即议和，一种主张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促成其东攻鲜朝，西征蒙古，南犯京师。另一种主张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议和既符合明朝和后金的利益，也反映了长城内外中华各族人民的愿望。天启末袁崇焕同后金议和，借以使宁远、锦州固若金汤，获得宁锦大捷。崇祯初朱由检未能采纳袁崇焕"款为旁着"的疏言，加速了明朝的覆亡。

第五，袁崇焕的籍贯。袁崇焕的籍贯有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和平南三说。多数人认为东莞为袁崇焕的祖籍，其籍应属广西。有人据乾隆《平南县志》和《三管英灵集》所辑袁崇焕《游雁洲》诗自注，认为袁崇焕为平南县籍。另有人主张袁崇焕为藤县籍，其论据除"明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碑记"、《崇祯实录》、崇祯《梧州府志》、《国榷》和故居遗物等资料